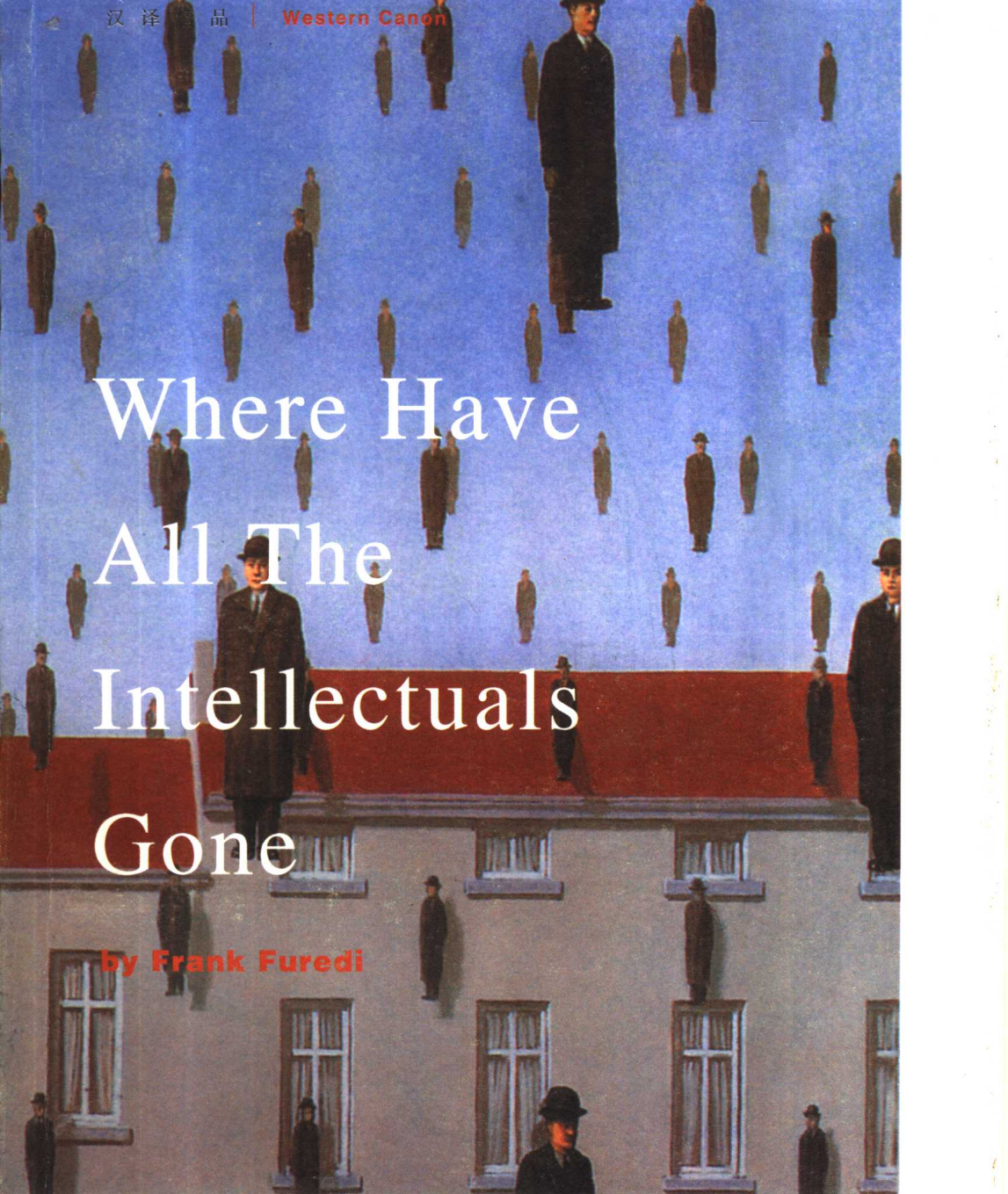


汉译精品 Western Canon



Where Have All The Intellectuals Gone

by Frank Furedi

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

[英] 弗兰克·富里迪 著

戴从容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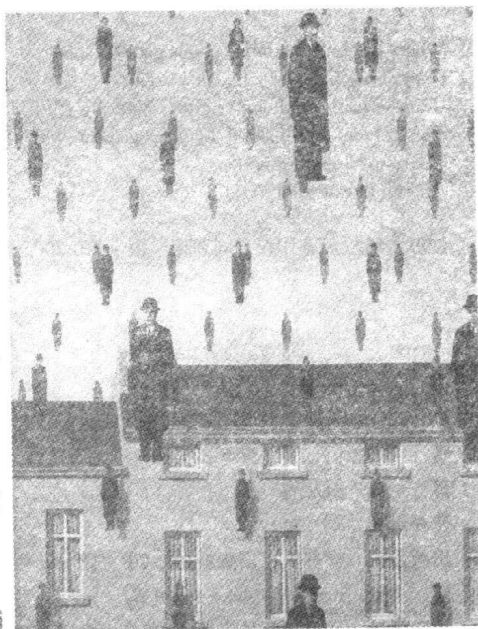
汉译精品 | Western Canon

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

[英] 弗兰克·富里迪 著
戴从容 译

Where Have
All The
Intellectuals
Gone

by Frank Furedi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 / (英)富里迪著;戴从容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汉译大众精品文库/吴源主编)

ISBN 7-214-04103-0

I. 知... II. ①富... ②戴... III. 知识分子—研究 IV. D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 第 088125 号

Where have all the intellectuals gone?

Copyright© 2004 by Frank Furedi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05 by JSPPH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Incorpora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05-035 号

- 书 名 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
——对抗 21 世纪的庸人主义
- 著 者 [英]弗兰克·富里迪
- 译 者 戴从容
- 责任编辑 刘 焱
-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 照 排 南京奥能制版有限公司
- 印 刷 者 扬州大学印刷厂
-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 印 张 5.25
- 字 数 109 千字
-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标准书号 ISBN 7-214-04103-0/D·611
- 定 价 13.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译者序

如今,真理、知识和道德价值越来越不再被认为是绝对的,而是代表着持有者的立场;知识分子也自觉地不再充当普遍真理的代表,而是特定群体或特定身份的代言人。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不分轩轻;博物馆和美术馆走入社区,展出早已被公众认可或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图书馆里增设咖啡厅,努力使自己变成休闲场所。学校越来越追求满足学生的需要,大学教师被要求去“支持”而不是改变学生;教师降低姿态,自称也在学习,同时也降低要求,一味肯定和鼓励学生的观点与努力。不同观点的讨论被等同于人身攻击;学术自由变成了对教学成果的量化审查;生活的经验被与学习而得的知识等量齐观。现代大学不是骄傲地远离商业世界,而是忙着为新发明颁发特许证,或者孵化高科技公司。富里迪(Frank Furedi)在这里描绘的这些现象,虽然是英美发达国家学术和文化世界的情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有些情形在中国同样存在,或者已经露出端倪。

这些都是正常的么?还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是大众化时代

的压力越来越大，还是知识分子失去了自己的立场？事实上，在不少官员眼中，这是文化向社会和民众迈出的积极的一步；在不少知识分子看来，这是学术走下神坛、走出象牙塔的积极举措。在《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对抗 21 世纪的庸人主义》一书中，富里迪系统概括了我们时代的这一平民主义的社会改造潮流，将其主要内容概括为“联系现实”(relevance)和“向公众开放”(access)，并指出它们深刻地影响和决定着管理者的文化政策，也决定着文化机构自己的方向和措施。

单从字面上看，“联系现实”和“向公众开放”是民主化进程的一部分，无可挑剔，但是富里迪指出，一旦像联系现实和向公众开放这样的价值获得了根本的重要性，它们就成了教育和文化生活的仲裁者。这样，一个学说、一出歌剧或者一出莎士比亚戏剧的价值，都取决于它是否联系现实和向公众开放。从这样的角度来对待文化，有两个主要的弊端。一是在具体操作时，文化精英们往往把公众当作理解力低下、感情脆弱的儿童，为了迎合这样的公众，文化精英们屈尊俯就地降低难度，降低要求，降低文化和学术的水准。二是文化和学术变成了实现民主化进程的工具，而工具主义的问题在于，假如我们不能因学术和文化的成就本身而重视它们，衡量它们的标准就变得可以讨价还价了。没有了内在的标准，也就无法再区分出高下，更无法评判和赞颂优秀者。其结果是助长了对真理和知识的相对主义态度，表面上人人皆有建树，实质是水准的不断下降。

富里迪把这种情形称为“弱智化”，指出弱智化是由若干强大的力量推动的，这些力量把知识和文化仅仅当作实现更大、更高的目标的手段。在这些力量中，不惜一切代价地倡导包容政治的公

共政策起着关键作用。不过,富里迪真正批判的,不是推行这一政策的政治家,因为在他看来,从古至今,政治家,甚至文化机构,总会试图控制和利用文化资源。而使今天的弱智化文化空前泛滥的,是艺术和教育世界从内心里接受了媚俗文化。学者和艺术家一反传统的社会批判立场,对庸人主义社会改造工程乐观顺从。从这一点说,归根结底,还是知识分子本身出了问题。

对知识分子精神缺失的呼吁,对知识分子职业化和技术化、放弃其社会职能的批判,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但是过去还没有人如此系统和深刻地将文化精英的溃退与当代学术和文化的弱智化直接联系在一起。人们往往倾向于把学术上的失范、当今学术界的不良现象归咎于对学术工作的量化考核,却没有看到正是知识分子自己充当着这一考核的工具。用富里迪的话说,“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积极地从内心里接受了文化媚俗政治,而其他人通过不情愿地服从机构的要求,也找到了一种轻松的生活。”

对于今天的青年学者来说,学术上的违规有时不仅是个人自觉的堕落,也不仅是在考核压力下无奈的取巧,有时事实上就是对学术规范的无知,因为现在越来越没有人告诉学生,学术规范是什么。就像富里迪在书中所描述的,以向公众开放为原则的教育重视的是走入校园的人数,这使得严格的规则、教育和训练被代之以流水线加工式的学分争取和文凭颁发,最终的受害者,正是作为开放和包容运动对象的学生与大众。因此难怪富里迪呼吁,现在到了为公众的心灵和头脑发动一场思想之战的时候了。

弗兰克·富里迪 1948 年出生于匈牙利,1956 年随家人移居加拿大,20 世纪 70 年代后移居英国,是英国肯特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他曾用弗兰克·理查兹这个名字成立了大不列颠革命共产党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并任该党的主席。该党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和自由派的反中央集权立场。该党在 80 年代出版了报纸《下一步》, 90 年代又出版了杂志《活着的马克思主义》, 此外还有网站弃置新闻网 (spiked online) 和思想学会 (Institute of Ideas) 等机构。富里迪至今依然是“活着的马克思主义”团体中的领军人物。

富里迪的学术研究主要围绕帝国主义问题和发展问题, 有《神秘的过去, 难测的未来》(1991)、《帝国主义的新意识形态》(1994)、《殖民战争与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政治》(1994)、《人口与发展》(1997)、《无声的战争: 帝国主义与变化的种族观》(1998)。除了学术研究外, 富里迪也常被媒体称为社会问题专家, 探讨我们的社会如何被危机感所困扰, 在这方面他著有《恐惧的文化》(1997)、《疑神疑鬼做家长: 为什么不信专家意见对孩子才最好》(2001) 和《心理治疗文化》(2003)。

知识分子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鲜的问题。在我的学习生涯中, 我的两位导师——南京大学的杨正润教授和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也都对这个问题有深入的关注。杨老师翻译的保罗·约翰逊 (Paul Johnson) 的《知识分子》一书几次再版; 陈老师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与王晓明、张汝伦、朱学勤等人共同发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在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此外, 正是陈老师对萨伊德 (Edward W. Said) 的《知识分子论》的介绍和推重, 促使我写了《世俗批评家和流亡知识分子——爱德华·萨伊德的知识分子观》一文, 该文最初发表于《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后被《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转载。正是由于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所受的熏陶, 以及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使我欣然接受了江苏人民出版社向我推荐的翻译此书的工作。对

于高等院校的教师,知识分子问题是一个永恒的问题,而对当代学者来说,本书所讨论的正是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面临的迫切问题。在这个时代,就如富里迪所说的,一场对抗庸人的文化战争早就该开始了。

最后我要借此机会感谢我的父亲和母亲。接受本书翻译任务的时候,恰好儿子刚刚坠地不久,如果没有二老的全力相助,我可能根本无法完成这个工作。

前 言

一段时间以来,我深切感受到知识分子的迷失,并为此烦恼不安,这种感觉似乎困扰着我们文化机构、大学和专科学校中的许多人。公众有权听到来自我们文化机构的高质量的学术讨论,而且,作为有着无限潜力的听众,他们应该受到更大的尊重。本书就是写给众多聪颖的男男女女的,他们渴望一种更具挑战性的学术和文化生活。

《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一书中阐述的观点是我和朋友和同事们的不断交谈中发展起来的。我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上发表了有关大学的若干文章后,收到源源不断的读者来信,这使我确信许多人与我有着同样的担忧。我与美国朋友的讨论表明,学术机构正变得弱智的现象不仅仅在英国存在。2003年夏,思想学会在伦敦组织了一次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研讨会,更加促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转向了对文化政治这一更大问题的探讨。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不断收到乔西·阿普尔顿(Josie Appleton)的反馈和批评。不论效果如何,我的许多论点的取向都应

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

归功于她。我也从思想学会的两位干将，蒂法尼·詹金斯(Tiffany Jenkins)和克莱尔·福克斯(Claire Fox)提供的意见中获得许多启发。我的同事玛丽·埃文斯(Mary Evans)教授正在完成她的《大学之死》一书，与我分担了这一痛苦。珍妮·布里斯托(Jenny Bristow)帮我把手稿改得更为通顺。此外我还要感谢我的编辑，Continuum 出版社的安东尼·海恩斯(Anthony Haynes)，他在本书的整个完成过程中向我提供了慷慨的帮助。

目 录

译者序 —— 1

前言 —— 1

绪论：穿越庸人之土的个人旅程 —— 1

没有意义的知识 —— 6

平庸崇拜 —— 7

弱智化社会学 —— 10

对标准的讨价还价 —— 14

从英才教育到庸才教育 —— 17

优胜的价值 —— 18

本书写作目的 —— 21

第一章 知识分子贬值 —— 23

从强大的主人公到迷失的灵魂 —— 25

怎样才是知识分子？ —— 29

当代社会和知识分子 —— 35

知识分子角色的贬值	40
顺从的知识分子	42
第二章 琐碎的追求	47
启蒙传统的去魅	49
面对不确定的无能为力感	53
相对主义：竞相声称拥有知识	56
工具主义的妥协	64
第三章 弱智化	67
疏离的公众	72
最小公约数下的重新参与	78
精英主义平民论	82
第四章 社会改造	86
对独立自主的攻击	93
社会改造与市场	101
第五章 媚俗文化	107
通过肯定实现包容	113
将认可制度化	117
对普通人的颂扬	123
第六章 把民众当儿童	129
儿童化的文化	131
把民众当儿童	134
颠倒的势利	136
塑造温顺的公众	143
结语	145
参考文献	148

绪论：穿越庸人之土的个人旅程

庸人(Philistine)：一个欠缺人文文化的人；一个只对物质和日常事务感兴趣的人。^①

一些出乎预料的情况促使我创作了这本书。2001年5月，我为《星期日时报》写了一篇题为“如今大学起什么作用？”的文章，谈到我对英国大学的发展方向的若干忧虑。这篇文章集中探讨了当今校园中学术刺激与挑战的相对缺失。我讲述了大学生告诉我的一些故事，他们对他们的大学生涯深感厌倦；我指出，许多时候，学生们可以在大学里呆上一年而没有完整地读过一本书。

文章发表的第二天，我收到一位大学高级管理者发来的愤怒的电子邮件。此人显然被我的评论激怒了，指责我“故意”混淆是非。读了开头怒气冲冲的几行后，我以为他会指责我捏造事实，谎

^① *The Shorter Oxford Dictionary* (1963), p. 1487.

称大学生可以呆上一年而没读一本书——然而，这并不是他反驳的焦点。他对大学生远离书籍世界并没有意见，相反，他气愤的是我竟然傲慢地认定书籍应该在高等教育中占据优先地位。他抱怨说：“文章的语气显示，如果任何一门课程中，学生没有读‘整本书’，你就会认为这门课没有严格要求。”就他而言，书籍成了当今大学生可读可不读的额外资源。

这次通邮件之后的几个月，他在“整本书”一词上加的引号一直在我的头脑中萦绕不散。我早就预料到这篇文章会招来一定程度的敌意，但我没想到一所重点大学的管理者会以这样一种不以为然的对待对书籍的阅读。在这次通邮件之前，我一直相信，高等教育领导层的人尽管在教学方法和学术成就上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有着与我同样的焦虑，很可能对大学生活显而易见的陈腐平庸即便不感到窘迫，也会感到不安。我那时认为学术热情在高等教育中被忽视，是新的管理主义风气造成的出乎意料的后果，这股风气控制着学术和文化生活。我没想到会有人对庸人主义公开颂扬，就如来信者对读书的出乎意料的轻视所显示的。

不过我不需要怎么花脑筋就能认识到，这并非一个乖僻的大学管理者的怪异反应。所有将学术生活常规化的热心都被当代文化精英们视为应当受到一致嘲笑，他们这样做远非为了自我保护。此外，这位精英的做法遵循的是工具主义原则，只有当艺术、文化和教育成为工具，服务于更实用的目的时，才重视它们。

那些充满热情地追求自己爱好的个别学者越来越面临着被贴上“不切实际”(irrelevant)、“精英”(elitist)、“脱离社会”和“边缘化”的标签的危险。学问、对卓越(excellence)和真理的追求，不断被描绘为古怪的、任性的和不切实际的。“多少有些不可靠”，这是

英国教育大臣查尔斯·克拉克(Charles Clarke)对为教育而教育这一信念的描述,他坚持说他的政府没有兴趣支持“学者追求真理这一中世纪观念”。克拉克把对知识的渴望描绘为一种不切实际的中世纪偏见,这证实了目前许多教育和文化政策中弥漫的庸人风气。

这类态度并非仅仅属于英国社会或者任一特殊政党的政客。克拉克的保守党前任同样相信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充当经济增长的引擎。甚至在最好的时候,为思想而思想也只是一种理想,很少成为现实。不过,至少它是一个被社会的重要成员在外表上重视的理想。如今,它越来越与全球文化的工具主义风气相冲突。印度孟买大学(Mumbai University)英文系前系主任伍林达·纳伯尔(Vrinda Nabar)指出,“无论在学生中还是在大学里,人们越来越认为人文科学和语言是并非必需的个人嗜好”^②。美国的情况也是如此。1970—1995年间,大学里外语专业的学生人数下降了37%。

当然,对教育、艺术和文化的庸人态度并不是什么特别新鲜的东西。一些19世纪的伟大思想家——马修·阿诺德(Mathew Arnold)、尼采、歌德、马克思——已经感觉到了市场这一客观力量是如何影响艺术和文学的发展的。然而,今天,庸人主义的影响并非来自经济社会所要求的实用主义做法。庸人主义的影响并非只从外部指向教育和文化,它们也在政策制定这一最高层面被制度化了。现在出现了新兴的大学经理人、博物馆和画廊经理人,以及“知识”企业家,他们对文化和思想内容漠不关心。他们关心的是用文化去达成与其内容远不相干的目标。

^② Shabnam Minwalla, 'Commerce is the mantra of the moment in city colleges', *Education Times*, September 2003. www.educationtimes.com/arts.htm.

查尔斯·克拉克对“学者追求真理”这一信念表现出的蔑视体现了我们时代的风气。这类冷嘲热讽的态度得到一种共同看法的支持，这一看法用怀疑的眼光看待发现真理的可能性。以前，追求真理这一口号有时遮掩了各种各样的罪恶，所谓的真理有时是服务于既得利益者的意识形态。不过，至少真理因其本身而受到重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真理是科学的目标：“哲学是思考真理的科学”；在爱因斯坦看来，“追求真理比拥有真理更珍贵”。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同样对追求真理充满了热情，她对她的听众说，“不过我深深地知道，假如我们希望传授真理，我们就有责任清楚地、直言不讳地、不故作神秘地、毫无保留地传授它，心中充满对它的力量的充分信任”。在现代历史上，正是对真理的这一狂热追求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思想者。

不幸的是，当代文化认为真理只配在小说中出现，而不是智力追求的对象。它不断声称并没有真理这类东西。代替真理的，是人们被敦促去接受不同的观点，认为它们代表了不同的真理。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声称并不存在“真正普遍适用的真理”，这一说法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真理很少被当作客观事实，而是常常被描绘为主观见解的产物，与其他同样令人信服的看法相抗衡。相对主义——这一看法认为真理观和道德价值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取决于持有该观念和价值的人或群体——对文化生活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观者眼中出真理这一观点对教育和文化机构的运作产生了深刻的冲击。假如真理被降格为主观的看法和阐释，它就不再具有本质上的重要性。它当然不是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它的发现也不再是任何重要机构证明其合理性的主要依据。一旦真理被视为一种可疑的主张，与其他许多主张争鸣，它就

不再在社会文化生活中扮演关键角色。

真理地位的降格对当代文化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对艺术地位的传统看法——“美即真，真即美”——显得与那种只以复数形式看待真理的潮流格格不入。学术生活同样必须经历重大的修正。就如一部研究大学角色的重要著作所说，“高等人文教育建立在这样一个假定之上，即客观知识和真理是能够获得的”，该书接下来又补充说，“随着当代哲学如相对主义、批判理论和后结构主义的发展，这一假定最近受到了质疑”。在该书的作者罗恩·巴尼特(Ron Barnett)看来，“这意味着从认识论的角度动摇了高等教育的根基。”^③至少，一旦高等教育自诩的提供通向真理之路的作用被颠覆，高等教育的意义也就改变了。

对真理的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在文化生活的更大表现领域中也清楚地显示出来。社会能够提供什么最好的东西，现在远不是那么显而易见了。首字母大写的“文化”让位给复数形式的“文化”，任何文化如果声称具有权威性 or 特殊地位，都会受到嘲笑。在一个真理变得如此难以捉摸的环境里，对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的传统区分丧失了意义。前英国文化大臣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回应了这一情绪，声称对“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的区分是一种误导，“乔治·本杰明(George Benjamin)与诺埃尔·加拉格尔(Noel Gallagher)^④都是一流的音乐家”。

贯穿整个人类历史，文化权威都声称代表着真理，这是他们的基础。如今，这种观点往往受到怀疑。事实上，这类说法不断被抨

^③ Barnett (1990), p. X.

^④ 乔治·本杰明是当代英国作曲家和指挥，创作了许多管弦乐、室内乐和钢琴曲作品。诺埃尔·加拉格尔是英国最流行的乐团绿洲乐队(Oasis)的领军人物。——译注